

清代天津满洲水师营述论

段益隆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天津满洲水师营是清代驻防体系中第一个由八旗官兵组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八旗水师营，同时也是有清一代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八旗水师营。水师营的设立既反映出清廷加强渤海湾海防的军事需要，也与清朝试图缓解京师闲散旗丁的生计问题有关。天津满洲水师营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八旗兵种，同时也提升了八旗兵的军事实力以拱卫京师的海上门户。但是也受到了水师人才缺乏、教督不严、管理不善、统治阶层海防部署的分歧以及八旗兵丁与当地民的矛盾等因素影响，最终使其在雍乾两朝仅仅存在四十二年也难逃被裁撤的命运。

关键词：清代；八旗；天津；水师营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7.245

引言

清军入关后，各项制度多沿袭明朝旧制，惟兵制多所创制革新。兵制的独特在于满洲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八旗制度，而清朝统治者创制的八旗兵制，则是一种集军事、行政、生产、经济等社会性功能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它成为适应统治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之需要，它的军事职能也被满洲统治者视为巩固国家统治的根本。为完善八旗兵制，清廷又创新设立以八旗官兵为核心的八旗水师。在众多八旗水师之中，首属天津满洲水师营设立时间最早且建制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为此，本文以天津满洲水师营为切入点，梳理其建立的背景、经过，以及营制和操练等内容，以期推进清代八旗水师等方面的研究，对了解清代京畿地区的海防建设也有一定的帮助。

一、天津满洲水师营建立背景与目的

（一）增强满洲武艺以备海防

天津满洲水师营始建于清雍正时期，其建立的背景，可上溯至康熙年间。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为稳固王朝基业，于内平“三藩之乱”，可见满洲兵乃雄兵浩荡；于外乃平定海疆两大战事，一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协助水师提督施琅剿抚台湾郑氏并收复台湾，二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福建水师总督施世骠同南澳水师总兵蓝廷珍镇压朱一贵举事，可见绿营兵水战勇武。康熙皇帝正是看到了在平定海疆中绿营兵所展现出的水战实力，得出“凡地方有绿旗兵丁处，不可无满兵”，欲想增强满洲兵在水战上的实力。正是受到了康熙帝的这种增强满兵军事实力思想的影响，为后

来雍正帝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埋下伏笔。

清朝初期，渤海海域经常受到盗匪袭扰，至雍正年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海盗愈发猖狂，他们常年肆虐于辽东半岛的洋面，侵袭沿海民众，劫掠海上商船，给沿海地区带来严重灾难，还威胁到清廷的统治。因此雍正皇帝在重视渤海海域的安全，维护沿海渔民及沿岸百姓生计，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以增海防之力又维护国本，可以有效打击海盗势力，还渤海海域安宁与稳定。

雍正三年（1725年），据《大清会典则例》记载：“设驻防天津府水师营，八旗、满洲、蒙古二千名”，另外最早涉及天津水师营的史料可以从雍正二年（1724年）发布的一则上谕“满洲兵丁于技勇武艺俱属精练，惟向来未习水师，今欲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分拨八旗满洲前往驻防操演，似属有益。其应于何处驻箭，设立几营，派兵若干，用船若干，并如何制造船只，如何演习兵丁之处，怡亲王会同拉锡、朱轼、张廷玉、蒋廷锡详议具奏。”，该谕虽未立即执行，但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十一日，帝复谕旨，由此可见即位后的雍正帝对满洲兵设立水师增加武艺的重视与关切。

虽说雍正帝在天津增设满洲水师是为增加八旗武艺使之军备完善或因“天津之海口为京师重镇”、“天津之海，东接盛京、朝鲜边界，南通福建、浙江等省，实海路之要口，京师之重镇”，作为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军事防御地区，亦需要有水师驻防以防海患，军事驻防是清朝皇帝建立满洲八旗水师营的目的之一，但八旗作为“国本”，对天津八旗水师营建设还有更加复杂的目的与背景。

（二）京师旗人生计有待解决

在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初二日清廷发布的一则上谕中，雍正皇帝谈到天津满洲水师营的初衷时，曾说：“闻得天津驻防兵丁之父母兄弟，从前派往时存留京师，数年以来陆续赴天津就养于子弟者甚多。此项兵丁原因京师难得官差，伊等子弟众多，而粮饷无几，未免度日维艰，是以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或系孤身或有情愿离其父兄之人，令其披甲前往驻防”。可以看出当年设立天津水师营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安置在京师地区难得官差的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

早在康熙年间，京师的部分旗人家庭就出现过生计困难的状况，其最直接原因便是人丁的快速增长与旗丁自身的奢侈腐化。特别是自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结束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旗人人口的数量增加很快，据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廷户部统计的京师八旗男丁数目“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康熙六十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可知当时在京八旗男丁总数是入关时的近三倍。对旗人来说，只有披甲当差者可以领取到固定的粮饷度日，但是兵额有限，虽然清廷屡增兵额来吸纳日益增长的旗人丁口，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滋生，问题仍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再者旗丁的日渐腐化与奢靡，又是旗人生计问题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雍正帝就曾在敕谕中指斥八旗子弟：“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闲、衣服饮饌，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邀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如此奢靡的生活必然需要大量的金钱供给，可按当时旗丁定时定量的固定粮饷收入是只能解决自身及家属日常开销生活，不足以过上如此奢靡生活，因此不少旗丁通过“指饷借债”以及变卖旗地的方式获得更多钱财，最终使得生活更加困苦艰难。防止旗人生计问题造成的危机威胁清廷的统治，自康熙到乾隆朝，清廷耗费巨帑，采用了汉军出旗、旗人可出旗为民、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以及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来缓解旗人生计问题可能诱发统治危机，影响统治秩序稳定。因而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便成为雍正皇帝缓解因旗人人丁日益滋生及旗人生计困难的一项重要举

措。

由此可见，雍正帝决定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的目的在于：一是增强满洲官兵武艺且有裨益于海防；二是妥善安置京师闲散旗丁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旗人生计问题进而维护统治。

二、天津满洲水师营营制建立和操练

（一）水师营的营制与规划

水师营隶属于八旗，清初主要有两种建制：其一，由绿营兵组成，归八旗驻防将军统辖，如顺治年间设有镇海大将军统管八旗官兵，并分左右二路水师驻扎镇江，镇守清朝沿海疆域；其二，由内地流徙的汉人组成的水师营，主要设置于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等处，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设立的吉林水师营和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黑龙江水师营。而雍正皇帝设立的天津满洲水师营才是真正意义上由八旗官兵组成的水师营，如此特殊的建制必然会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与研究价值。

关于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营制人员安排，雍正帝在谕旨中说明：“天津地方设立水师营分拨八旗满洲前往驻防操演”，根据营制安排，天津八旗水师设从一品满洲都统一名，统辖水师各营；如此高品级的统帅，在当时清军水师中实属少见，在八旗满洲水师序列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后来乾隆帝在京郊的昆明湖设立八旗禁卫水师，统帅的品级也不及天津水师都统，可见雍正帝对于天津满洲水师营的重视程度。在都统之下设协领6名，佐领、防御、骁骑校各32人。据直隶天津地区的《光绪重修天津府志》的记载：“雍正四年，设天津水师营都统一员，驻扎天津海口芦家嘴，兵两千名。”可证在天津海口芦家嘴处，另外设水兵2000名。“每满洲旗分各派二百名，设立三佐领；蒙古旗分，每旗挑选五十名，设立一佐领，立为左右两营。兵丁习练火器，为鸟枪手。并设副都统一员，令其总管”可见雍正帝又令满洲八旗与蒙古都统于各旗内挑选兵丁组建火器队，以此来壮大水师营军事实力。

关于水师营长官的职衔设置，在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朝廷将拟设立的直隶天津满洲水师营的副都统升格为都统，统领水师旗营一应事务，其下并未设立副都统一职。

另据《清实录》记载，天津水师营还设有总领教习一员、教习官，由浙江、福建两省挑送，三年期满，送部轮番更换，无一定职衔。水手有正舵工、副舵工、正阿班、副阿班等十类工种，各32名，共计水手320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月，筹办圆明园水操船只，增添新船八只，所需的舵工、船工等一应人员，均由天津水师营分拨，统归健锐营约束。

（二）水师营的日常操练

从《大清会典则例》的“天津水师营，每年四月起八月止出海。操演均择天气晴和潮平风顺时，官兵乘战舰出洋，列阵张帆起碇，掌号发炮，以次操练。停操之后，各督军率官兵讲习水务。”，可知有关天津满洲水师营的出海操练之况。而在渤海面秋冬结冰之际，天津水师营官兵则在陆地演练旱操，并在当年九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操演。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命俞琰抵津制造操演火器，向满洲水师营都统镇国公鄂齐报到。俞琰谙练战船火具，赏给守备衔。据鄂齐奏报，令俞琰经管战船、所需火具等项及制造火药之法，俞琰造有火箭、火浪、火号，业经请验试放外，随奉发到战船，操演炮位、鸟枪及兵丁下船操演鸟枪、火药、烘药、火绳、铅子等项，俞琰负责的火攻营有相当实力。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二十九日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报为择吉日祭海神，拟启船入海口沿边训练。拉锡在谈到工部咨开“将二千满洲兵丁编为左右两营，现有三十二船，每营各为十六，半月轮训一次。按此船需用，拨给大炮一百二十八、斗头炮十六、百子炮一百七十六，共计炮三百二十门，平均分给三十二船训练。”当时江南送来十二船内“随船运至大炮四十八门、斗头炮六门、百子炮四十八门。”虽不足额，可以训练。

当时“操演官兵分为两班，在于河内先教船上蓬舵旋缭如何使用之处，能识认、能站立以后，再教演放枪炮。”可以看出，水师营都统鄂齐计划将水师营分为左右两班，让水师营官兵轮流进行操练，逐渐习熟，以备战事所需。

关于水师营的日常训练，根据都统拉锡的相关奏报，可见水师营的操练初期，总是出现一些如斗头炮无

法正常发射、百子炮爆裂粉碎¹等细节问题导致训练不畅，无法过关的现象，所幸在福建的教习指导下，水师营的操演趋于正常。从雍正十二年天津水师营都统迈禄的奏报“水师营每年演武，自四月登战船，于海河往返操练，趁初一、十五大潮来水顺风吉日，即出海口，令兵丁操练攻战之道。到八月终后停止操练，将船收入船坞，令兵丁操练射箭、放枪、藤牌、挑刀。”可知天津水师营经过几年的认真训练，已经将日常的操练形成了制度继续沿袭。

三、天津满洲水师营军事功能与功用

（一）水师营的军事功能

从军事角度来看，自清军入关后，便开始实行八旗驻防制度，而八旗水师在构建清朝的海疆及边疆防务体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八旗水师营的存在也是八旗驻防体系稳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于八旗水师营的装备和训练一直以来十分受到清朝统治阶层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关严格的规定，清代八旗水师营是其在新的海疆联防形势下自身发展和完善的结果。

八旗满洲将松散的女真部族重新整合，适应了女真社会统一后的发展需要，而后清朝统治者又以八旗作为载体，吸收其他民族进入其政权之中，八旗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在此过程中八旗制度体现出了很强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八旗水师正是清朝统治者灵活地将松散的女真部族和京师闲散旗人集中整合，为了政治与经济发展和维护国本的需要，又充分考虑了旗人融入多民族政权中出现的生存压力，以八旗作为水师旗营的核心，既能维护旗人的地位，又能增加海防军事实力，进而加强渤海区域稳定并统御海疆，可谓一举多得。

从地理角度来看，清廷从战略布局上将天津作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关隘，渤海湾是京师防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支精锐力量防守，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满足了这一需要，如近代鸦片战争时，一旦渤海湾及天津海口失防，外敌将直逼京师威胁皇帝安危。因此无论是统治者保障国本的政治考量，还是说国家疆土与海防上的重要性，八旗水师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二）水师营的战略地位

清廷非常重视渤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海防战略地位，始终把控制渤海和保障渤海海域稳的安全稳定，作为清朝海洋海疆安全的重要任务。从地理区位形势来看，直隶天津海口作为毗邻京师的海上门户，其军事战略优势十分明显。从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其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及天津卫“其下去海不过百里……控扼襟要，诚京师第一形胜处也”中便可窥视出其重要的战略区位价值。因此，为保京畿地区的安全无虞，则必须在天津海口等地设立水师。清廷将渤海划入内洋自雍正年间始，因此在天津地区设立水师便是雍正帝对渤海地区加强行政与军事管控的重点。从清朝的海疆防御体系全面布局看，只要从军事上控制了辽东半岛铁山至山东半岛登、莱一线之渤海海峡的海域安全，也就能从一定程度上保障整个渤海地区的安全稳定。八旗水师出海控制海面使渤海海域处于安全状态，便可使天津地区安全无虞。

雍正帝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的本意不仅仅在于拱卫京津，而是用意甚远，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本的同时训练一支亲属清朝统治者的海上作战机动性力量，一旦突遇军事需要，便可随时调往各地，以备不测。另一目的在于管控渤海海域渔民正常经营活动保障民生，借用八旗水师的日常操练和船舰巡航来维护渤海地区的海运正常，以及天津港港口的货物贸易安全，以防海盗时常侵袭渤海沿岸地区，从而对清廷的渤海湾地区的港口贸易以及税收造成不好的影响。

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各地的八旗驻防体系不同程度进入到新发展时期，从政治与经济方面不同角度的考虑，为了更好地推动和完善八旗水师营体系。皇帝作为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代表，针对渤海地区的驻防八旗体系，不仅要根据驻防区域的特点丰富并完善八旗兵种并提升其军事实力，还要起到维护海疆稳定并巩固统治秩序的作用。因此，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正好可以弥补天津驻防八旗体系中兵种的不足问题，且巩固海疆防御体系。

（三）水师营的营运之效

天津满洲水师营官兵的俸粮，每年就至少需要米共计一万多石，且主要来源于天津北仓所供给的漕运米

粮。而天津北仓地方距离天津海口芦家嘴，单只论水路距离就有一百五六十里。而且每次运送米粮量大，且开销巨大，也有所损耗。因此，天津满洲水师营都统拉锡奏明，应于芦家嘴堡城内西北处，照北仓康座式样盖造康房二座，并配套设置公署三间，大门一间，看守房三间，四周围筑高墙，谨防米粮被偷盗。

关于天津驻扎水师营官兵平日所需食盐，水师营官兵刚来津时，先由同知垫支，从当地的商人手中购买，待水师营官兵建设营盘后，居住稳定后，则按当地盐价，自行购买。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初四日《都统拉锡奏报抵天津水师营整饬营伍情形折》，其中详细地记载了天津满洲水师营兵丁的生计问题。当时的水师营核计“家口人多之兵丁详细核查，每月不足之米共计二百五十石有奇”，可见，每月供给水师营兵丁的口米不足的家庭很多，其缺米数额共计二百五十石，按时价折银二百五十余两。当时雍正帝也曾恩赐银两给天津水师营，供给其解决生计问题，都统拉锡汇报了使用的情况。

为解决天津满洲水师营的米粮缺乏情况，便允许在营内开设米铺，供官兵使用。官兵们计划利用出海时，进行贩卖货物并通过转手贸易获利。水师营都统拉锡还提出三项开源节流的生计对策：一是兵丁可出海捕鱼和运送米粮来获利，补贴兵丁每月米粮不足的情况，也补贴官兵平日红白之事的度支；二是帮助水师营营盘周围的平民挖井取水，赚钱佣金，并使买水者节余水钱；三是令水师营兵丁分为两班，并轮流割草编制以省买草的钱，也可对外进行贩卖，获得一部分的营收。另外还提出开垦水田，进行耕植的建议。最终，天津满洲水师营在君臣的筹划之下，通过朝廷赐银营运滋生、雇募渔民捕鱼、出海贩卖货物、挖井取水以省水钱等措施，克服了水师营成立初期营运的困难，保证了天津水师旗营兵丁的基本生计。

天津满洲水师营关于滋生银两的经营也很有成效。据都统迈禄奏报：“滋生银三万两，自雍正七年三月至十二年五月，获利钱、田租银共四万八千八百九十五两三钱余。”其中赏赐银两，兵丁补贴红白之事的用度，还额外给兵丁增加平日所需米粮一斗五升之外，“开除

一切所用后，实余息银共三万一千七两三厘余，皆与数额相符，并无亏欠。”到乾隆年间，可以看出水师营官兵利用朝廷所恩赐银两营运，又通过滋生银两经营生息效果显著，天津水师营滋生银经营生息后，所剩银两还接济其他营运困难的驻防旗营。以至于，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天津水师裁撤时，“营内滋生银五万六千五百五两，核与原数相符，所有现存本利银数，请仍交长芦盐政生息。”所剩银两如此之多，足可见天津满洲水师营官兵们的营运之法以及滋生银经营之效颇丰。

四、天津满洲水师营裁撤与历史影响

（一）水师营的裁撤缘由

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四月初二日，天津满洲水师营被裁撤，其水师营官兵被清廷分别移派于凉州、福州、广州等地分驻，其余均转为陆营编制。由此，论及存在仅仅四十二年的天津满洲水师营，这样如此重要的海防军事机构存在时间如此之短，考虑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其原因。

据《清史稿》的记载，乾隆三十二年，以海口无事，徒费饷糈，天津水师营全行裁汰。以及《天津政俗沿革记》中说：“乾隆三十二年，以水师营防海口，今海面久已安谧，将驻防各兵移拨他省，所有水师营员额悉裁。”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裁撤天津满洲水师营的根本原因在于，乾隆中期的海疆相比康熙至雍正朝时期承平已久，天津附近的海域长期无事态发生，从统治者的军事和政治角度出发，需要把这些兵力和军饷投到更需要维护的地方上去。

由于天津海域长时间无外患，使得天津水师营的满洲官兵军纪涣散、战斗力严重下降，也达不到水师的正常作战水准，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既衰老，却仍担任都统，以致所领兵丁操练十分生疏不规整，甚至不能清语，颓至战马都不能乘骑。特别是自乾隆七年增兵水师营以来，官兵平日也不演习技艺，混沌度日，聚集于船舱内赌饮，使得水师营有名无实。这才有《光绪重修天津府志》中记载的清高宗阅视天津水师营时，正值风浪大作，海船逆势难以施演，时任水师营都统为奉义侯英俊，年老体衰，军甲重而致行动迟缓，骑马尚不能自如

应对，且所传军令错误较多，水师营官兵及兵丁的技艺和国语骑射疏于训练，导致队伍紊乱，喧哗不绝。见此操演情形，清高宗勃然大怒，于是下令裁革天津水师营。这便成为乾隆帝裁撤天津水师营的直接原因。后有军机大臣等上奏“查天津向无满兵，雍正三年因天津界海，为福建、浙江、江南、盛京等处商船出入要隘，驻兵两千名。乾隆九年增一千名，二十五年奏裁五百，现驻两千五百名，养育兵三百四十二名。此项兵为防海口而设。今海面久已宁谧，自可移拨他省。”，乾隆帝旋即依奏给出裁撤水师营的决议。

对于天津满洲水师营裁撤后的详细安排，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在乾隆三十二年四月之时，清廷便有考虑过对天津水师营裁革的相关事宜。水师营所辖的2500名兵丁，有358名愿出旗为民，有334名愿改为绿营兵，拨归直隶总督、提督及各镇禁营，于马、战、守兵缺出顶补。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将其余兵丁1081名移驻凉州，229名移驻福州，498名移驻广州。300多名养育兵除孤单无靠、不能派往者外，其余均随家属前往福州、广州、凉州。作出如此详细的去向妥善安排，主要是由于乾隆平定准噶尔战事后，设置伊犁将军统辖回部和新疆地区，哈密和巴里坤以西地区皆成内陆，凉州一带皆成腹地，急需调配兵丁以补缺驻防。南方的福州驻防将军又奏请调兵加强广州驻防，以补充原缺。

满洲兵向来不熟悉水师，水战操演也不精练，且水师人才一直缺乏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又由于天津满洲水师营历任都统等辅佐官管理不善，导致水师营营务日渐废弛，兵丁的腐化和奢靡问题积重难改，每年在水师营维护上银两支出较多，收效甚少。故乾隆皇帝从综合原因来考虑，并借机裁撤天津水师以补凉州、福建、广州的营伍之缺，亦才有如上细化的整理与安排。

（二）水师营的历史影响

总体来说，天津满洲水师营是清廷在稳定海疆与海防之重的需求下孕育而生的。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和裁撤及消亡，对清代的海防体系以及统御海疆的能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雍正时期由北自南的海疆八旗水师营的设立不断增多，其中既有清初平息抗清势力后统治增强满洲兵武艺

的要求,也有稳定海疆与海防建设的需要,以及解决旗人生计等问题的考量。从主观意图上来看,清廷试图建立以八旗水师体系为中心,以强大沿海防御作战机动性力量为保障的海防体系,以摆脱绿营兵的水战制衡,是首崇满洲政策的必然结果。但从军事全局观的角度来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八旗水师在沿海防御及海防体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重要战略地位、重视程度及认识明显不一致。且在乾隆中后期,由于清廷对水师面临困境与挑战时的特殊性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对水师营的营务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再加上清朝海疆承平已久,跟清廷对于改善海防状况的积极性下降,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居安思危的意识逐渐淡化且意见不一致,态度暧昧不清,对于进一步改善船舰技术、火器技术、操演制度等都缺乏积极性,致使水师营官兵不思进取,对平常的检阅都敷衍了事,更有大量水师营兵丁荒废训练,聚集船舱戏耍赌饮。这样的满洲水师营日渐腐化,终难逃被裁撤的悲惨下场。

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裁撤与消亡对清代中后期的海防体系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水师转陆营后,使渤海海疆一旦有事,海防线上将无兵可用,沿海关隘面对外敌水兵入侵时也将不堪一击。沿海地区水师一旦缺乏满洲八旗的参与,粮饷也会逐渐减少,使该地区官兵生计也将日益疲困,同时水战的武器也将缺乏改良的动力,最终成为摆设。虽乾隆以后每逢海疆动乱,天津水师又因时局几度起废,但限于清朝国力逐渐衰颓,八旗官兵的战斗能力也日益弊态尽显,想要恢复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荣光已成幻想。

以天津满洲水师营裁撤为标志,清代以旗营为特色的满洲水师的海防体系出现缺口,自此随着清朝国力的逐渐衰颓,八旗驻防中的八旗水师驻防体系也逐渐走向了衰败。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 [2] 《大清会典则例》[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 《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 《清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8] 《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嵇璜.《清朝文献通考》[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10]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

[11] 《天津府县志辑③民国天津县新志》:《天津政俗沿革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双成编译.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总理户部事务允详等为报顺康年间编审八旗男丁事奏本.历史档案[J].1988年第4期.

[13] 沈家本、徐宗亮.《光绪重修天津府志(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14] 冯尔康.《清史史科学》[M].沈阳:沈阳出版社,1985年.

[15] 孟森.《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6] 罗尔纲.《绿营兵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7]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8] 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19]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M].合肥:黄山书店出版社,1998年.

[23] 福隆安等.《钦定八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